

媒介化治理视角下乡村文化政策主题演化与区域适配研究

——基于 LDA 的央地政策文本分析

刘美忆

摘要：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政策正经历从单向输送到多元共治的范式转型。基于 LDA 主题模型对 53 份乡村文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数字文化服务与非遗工坊建设构成政策传导的双轴,文化产业科技与全域振兴则形成为实践转译的两大支点,央地政策共同呈现出“技术嵌入—主体激活—产业创新—制度协同”的演化逻辑和“创新驱动—选择适配”的传导机制,媒介化治理则呈现“制度重构—实践转译”的动态平衡。中央政策通过制度性媒介构建治理势能,在数字基建领域形成战略引领;地方实践依托资源禀赋实现政策转译,在科技赋能层面展现在地化策略。有鉴于此,媒介化治理需兼顾顶层设计的权威性与基层创新的灵活性,构建差异化发展与跨区域联动机制。

关键词：媒介化治理;LDA 模型;乡村文化政策;主题演化;区域适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12-0171-06

在数字中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媒介化治理正成为重构乡村文化治理范式的关键路径。政策文本的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更依赖于其与基层文化实践的媒介化互动程度。媒介化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媒介技术重构治理主体、过程与效能的互动关系。

政策文本的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主题建模通过识别文本隐含主题结构,实现大规模政策语料的系统性降维与历时性追踪,为媒介化治理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创新路径。在乡村研究领域,LDA 模型的应用已展现出较强解释力。陈玲等运用该技术解码政府开放数据政策,发现“技术设施”与“公民参与”主题的强度失衡^[1];郭强等通过主题演化分析,揭示农业农村科技政策中创新驱动类主题滞后于资源投入类主题^[2];徐红等基于“学习强国”平台农村阅读推广文本,运用 LDA 与共词分析法识别治理举措主题^[3];邓崧等则结合政策工具

与动力视角构建二维框架,量化分析数字乡村政策^[4]。这些研究共同验证了 LDA 在捕捉政策焦点偏移与潜在治理矛盾方面的有效性,为媒介化治理研究提供了量化支撑,但现有研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如政策层级分析的缺位导致对央地政策主题差异的忽视,政策文本与实践语境的割裂使得地方政策的在地化策略难以被捕捉等。

本研究拟构建媒介化治理视角下政策文本与文化实践互动的分析框架,以央地乡村文化政策为研究样本,结合 LDA 主题模型分析,聚焦三个核心问题:政策文本中媒介化治理的主题谱系如何构成?央地政策主题强度与演化路径存在何种结构性差异?乡村文化治理主题经历了怎样的历时性变迁?通过横向比较央地政策主题上的强度差异,纵向追踪央地政策主题演化,试图解释政策焦点的转变以及区域禀赋对政策落地的调节作用,为政策文本效能及其与文化实践的互动机制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收稿日期:2025-09-24

作者简介:刘美忆,女,新闻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河南郑州 450001)。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媒介化治理视角,考察国家通过政策文本将媒介逻辑制度化的宏观机制,和地方执行对文本再语境化的微观实践,以解析央地政策主题的结构性差异与地方执行强度分化的动因。

(一) 媒介化治理理论谱系

媒介化治理理论作为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分析框架,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制度主义媒介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库尔德利提出媒介化的本质是“政治行为人主要传播手段的转换”,揭示了媒介逻辑对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渗透,即媒介不再只是传递信息的渠道,还通过渗透公共空间、政策制定与社会互动,进而重构权力运作^[5]。这一理论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两大分析范式:制度主义路径以斯蒂格·夏瓦为代表,将媒介视为具有自身运行规则的社会机构,通过制度化规则与教育、政治等社会领域实现双向适配,而非单向技术决定,即媒介既塑造社会实践,又被社会实践所形塑^[6];社会建构主义路径则由安德烈亚斯·赫普推动,“深度媒介化”强调数字媒介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本体论重塑,媒介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社会文化现实的传播建构过程”^[7],进而深刻改变社会关系的生成方式。两种范式虽路径分殊,却共同指向媒介化治理的双重面向,既是媒介逻辑对治理各环节的渗透,也体现着治理主体通过媒介实践重构权力网络的动态过程。

国内学者进一步拓展其内涵,郭小安等强调媒介化治理需实现政治逻辑、媒介逻辑与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耦合,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网络,推动治理模式从“管理”向“共治”转型^[8];李春雷等则从情感治理视角补充,认为媒介化治理的本质是建立情感共通和共识达成的参与式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建构存在内在逻辑同构^[9]。然而,媒介化治理理论面临本土化困境,在乡村场域的适用性需突破西方“媒介中心主义”的范式桎梏。西方语境下的理论假设忽视中国乡村行政主导型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政策刚性约束对媒介赋能的规制效应未被充分纳入分析框架。媒介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表明,乡土社会的历时性文化积淀与差序格局特征,要求理论构建必须超越技术决定论,在政策文本的现实约束与乡土文化肌理间寻找平衡点。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系统构建2018—2025年乡村文化政策文本语料库,覆盖中央及东、中、西部地区六省(浙江、江苏、河南、湖北、四川、云南),共计53份政策文件,其中中央23份,地方30份。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权威性,文件均源自中国政府网及省级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数据;二是时空代表性,时间跨度覆盖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期与数字乡村建设关键阶段,区域选择依据政策创新性、文化资源禀赋与治理复杂性,并形成东、中、西部梯度覆盖格局。最终语料库涵盖发展规划、实施意见等多种类型,剔除弱相关文本,经筛选整理后形成兼具政策层级代表性、主题覆盖全面性与时间动态连续性的语料库。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LDA模型为核心分析工具,对53份政策文本进行主题挖掘。LDA模型基于贝叶斯概率框架构建“文档—主题—词项”三层概率分布,通过无监督学习机制自动归纳文本主题特征词并挖掘潜在主题内涵^[10],将高维稀疏的原始文本映射至低维主题空间,实现政策内涵的定量化降维与结构化解析。相较于传统内容分析法,LDA模型的优势在于:一方面通过无监督学习规避主观预设,客观识别政策焦点演变;另一方面基于“文档—主题”概率矩阵支持跨层级(央地)与跨区域(东、中、西部)的纵向历时比较与横向对比。

在模型构建中,采用困惑度与主题一致性指标优化主题数量,通过词项概率分布提取主题关键词并结合政策语境进行命名解读,最终通过主题强度及其演化分析揭示政策主题的时空演化特征。

(四) 主题模型构建

文本预处理环节,采用jieba分词工具,结合“数字乡村”“非遗工坊”等专业复合词领域词典对原始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加载哈工大停用词库并补充政策领域无关虚词,剔除标点、日期等非语义字符;通过词频阈值过滤移除低频词与泛化词汇,最终通过gensim库生成“文档—词项”频次矩阵作为模型输入。

模型训练阶段,依托贝叶斯概率生成框架设定参数 $\alpha=0.1$ 、 $\beta=0.01$ 以控制过拟合风险,设置训练轮次20次、抽样迭代100次确保参数收敛。

主题数确认环节,在K=1—15范围内进行模型训练,采用困惑度(Perplexity)与主题一致性(Coherence)双指标验证最佳主题数:首先测量主题一致性得分,通过肘点法识别曲线拐点,结果显示主题一致

性得分在 $K=4$ 时达到峰值(如图 1 所示);其次计算困惑度指标,主题数大于 4 后困惑度下降趋缓(如图 2 所示)。综合两项指标最终确定最优主题数 $K=4$,此时主题内聚性与区分度实现最佳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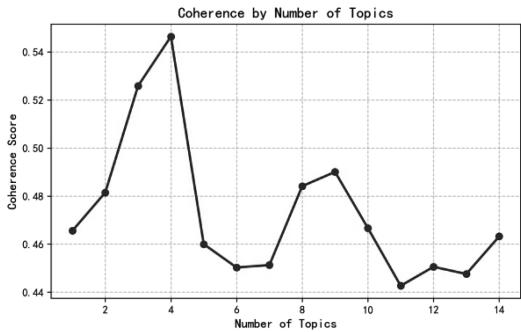


图 1 主题数与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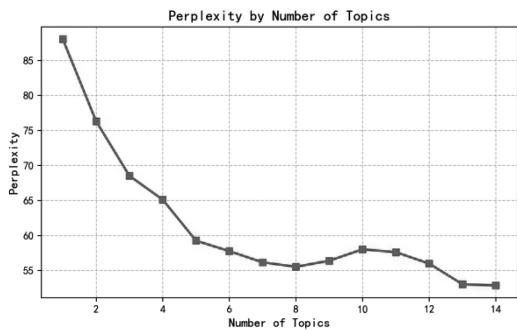


图 2 主题数与困惑度

二、实证分析

(一) 主题识别与特征解析

运用 LDA 模型对 53 份中央与地方政策文本进行主题挖掘,最终确定 4 个核心主题。结合政策文本的实践指向与媒介化治理内在逻辑,将主题依次命名为“数字文化服务”“非遗工坊建设”“文化产业科技”“乡村全面振兴”,系统揭示政策文本中技术嵌入、主体激活、产业创新与制度协同的演化轨迹。

“数字文化服务”主题以“文化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等为特征词,体现技术作为文化治理工具的基础逻辑。中央层面通过《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数字平台定位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地方实践如《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依托数字技术将红色文化、生态旅游等资源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资产,实现文化服务的媒介化重构。这显示出政策通过数字化手段完成文化资源价值转化与传播效能提升的治理导向。

“非遗工坊建设”主题聚焦“非遗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等关键词,揭示政策将非遗

保护嵌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与地方《江苏省关于建设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形成政策联动,通过专项资金支持与资源整合推动非遗工坊可持续发展,印证激活在地化治理主体的重要性,体现政策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地的传导机制。

“文化产业科技”主题以“文化科技”“文旅融合”等为特征词,凸显技术融合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通过认定标准与支持政策培育示范项目,地方实践如《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运用 VR/AR 等技术手段,提升乡村文化旅游体验感与吸引力,实现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变现。这一主题揭示技术作为文化资源转化杠杆的深层逻辑,即通过算法推荐、数字化展示等技术手段完成文化价值的市场转化。

“乡村全面振兴”以“千万工程”“乡村治理”等为特征词,体现政策在宏观战略层面的系统性与协同性。中央《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通过优化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明确总体目标,地方实践如《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提供法治保障,推动文化、经济、生态协同发展,展现媒介化治理宏观制度设计,通过政策协同完成全域治理的顶层架构。

(二) 央地政策主题的层级分工与治理效能差异

通过 LDA 模型对比中央与地方政策文本的主题强度,发现央地政策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呈现互补性特征,其主题分布差异反映了媒介化治理的层级分工逻辑。中央政策在数字文化服务、非遗工坊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三大主题上形成相对优势,而地方政策则在文化产业科技领域表现出显著主导地位,这种分布格局与政策主体的职能定位相契合。

中央政策的技术引领性特征突出,数字文化服务的高权重印证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建设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顶层设计,其通过全国文化大数据体系等举措构建技术驱动的治理制度框架。相比之下,地方政策更侧重实践导向与主体激活:云南省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推动非遗与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推广和销售渠道;江苏省提出建设“文旅科技融合示范区”,通过 VR/AR 技术打造红色旅游复合型产品,实现文化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数据显示,地方在文化产业科技的主题强度较中央高出 114.0%,东部省份凭借数字基础设施优势形成技术驱动的集聚效应,中西部省

份通过“非遗+文旅”融合模式实现政策强度与实施效果的良性互动。

数据分析表明,央地政策在主题实施中存在显著效能差异,同时存在层级分工,既保障了国家文化治理目标的统一性,又为地方创新预留了弹性空间。地方在非遗工坊建设和文化产业科技上的投入产出比显著高于中央,主要源于资源禀赋与制度创新的策略:东部省份依托数字基建优势,中部省份通过资源整合协同,西部省份借助非遗资源禀赋,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路径。

(三)区域政策主题的适配逻辑

六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显示,各省主题强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反映出地方治理资源禀赋与发展战略的差异化适配逻辑。浙江、江苏等东部省份在数字文化服务或文化产业科技领域形成技术驱动的创新闭环;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在非遗工坊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间呈现协同发展态势;四川、云南等西部省份则依托非遗资源禀赋,在非遗工坊建设层面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

具体来看,浙江通过“文艺赋美”工程,运用沉浸式剧场、云演艺平台等科技手段创新演艺形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云南在《云南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三年行动(2023—2025年)》中明确将非遗工坊建设纳入强省目标,打造乡村旅游集聚区与农文旅融合示范点;江苏通过数字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科技的组合,揭示科技赋能数字基建的融合发展路径;河南在乡村全面振兴的主题强度居六省之首,通过“非遗工坊+文旅线路”融合展现政策协同创新。

这种区域分化构建起“政策刚性—文化弹性”的调适机制,即东部技术驱动、中部资源整合、西部特色保护的梯度分布,既保障了国家文化治理目标的统一性和协同性,又通过在地化策略实现技术逻辑与乡土实践的多元适配,为破解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数字悬浮”问题提供了实践范本。

三、媒介化治理视角下 主题演化机制分析

以媒介化治理视角观察我国央地乡村文化政策,可以看到其已从传统意义上的“送文化下乡”转向以媒介为枢纽,旨在激活内生动力、重构治理网络的新阶段,央地政策的主题演化正体现着媒介逻辑深度融入治理逻辑的过程。

(一)央地政策主题强度的时空分异与传导逻辑

基于LDA模型对2018—2025年政策文本的动态追踪发现,央地政策主题强度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其演化轨迹反映了媒介化治理的传导机制与地方实践逻辑。

从空间维度看,中央政策通过制度性媒介构建治理势能,形成中心辐射与边缘响应的强度梯度差。乡村全面振兴主题的中央强度在2025年达到峰值,这与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及后续配套政策形成制度共振,标志着政策重心从单一产业扶持向全域协同发展的范式转型。相较之下,数字文化服务主题的强度衰减效应突出,中央政策在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驱动下于2020年达到峰值,而地方同期强度仅0.012,暴露出技术治理在基层的传导梗阻。非遗工坊建设主题则呈现央地协同特征,中央于2023年达到强度高峰,与地方实践形成中央定调、地方落地的治理共同体。

时间维度的演化轨迹揭示了政策主题的阶段性偏移。中央政策在2018—2025年间完成显著的主题轮替。文化产业科技从2018年的主导地位断崖式下降至2025年,而乡村全面振兴则实现从边缘议题到核心战略的蜕变。这一转变在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推广“千万工程”经验中得到制度化确认。地方政策的时间路径更具延续性,非遗工坊建设强度在2020—2023年间持续攀升,与中央2022年“非遗工坊建设专项行动”形成政策共振;文化产业科技的地方布局则展现后发优势,2023年强度首次超过中央政策,反映出地方在承接国家战略时的执行弹性。

关键政策节点与强度峰值的精准对应,体现了媒介化治理的文本驱动特征。中央政策在数字文化服务领域的爆发式增长,响应了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赋能,以及2020年《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确立的“上云用数赋智”转型路径;非遗工坊建设的2022年中央政策峰值与出台的《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密切相关。地方政策则呈现出渐进式特征,持续聚焦实体性建设项目,在乡村全面振兴主题中形成滞后响应,且存在两年左右的执行时滞,这种时空压缩效应印证了中央创新驱动、地方选择适配的差异化逻辑。

(二)政策响应的双向互动机制

政策响应逻辑的差异性在主题演化中呈现显著特征,其动态机制可概括为中央创新驱动、地方选择

适配的双向互动模式。从制度主义视角审视,中央政策通过文本媒介构建了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框架,实现媒介逻辑对治理各环节的渗透。乡村全面振兴主题的响应体现了这一点,中央政策强度在2020—2023年间实现爆发式增长,2023年达峰值,直接呼应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及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的政治势能。这一过程体现了媒介作为社会机构的制度化适配逻辑,中央通过政策文本将媒介逻辑内化为治理规则,推动治理模式从“管理”向“共治”转型。

然而,地方对中央价值型主题的响应存在显著时滞。如乡村全面振兴主题的地方强度远低于中央峰值,且将政策再媒介化为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等具体实践,这反映出基层治理中社会逻辑与媒介逻辑的张力。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要求政策执行需超越文本的刚性约束,通过实践转译实现与地方文化肌理的适配。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地方政策执行成为媒介实践再生产的关键场域,治理主体通过技术赋权重构权力网络。非遗工坊建设主题的央地协同即为典型案例,中央政策保持稳定强度,通过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释放制度激励;地方响应效能显著,2025年强度达峰值,形成中央定框架、地方创实践的治理共同体。

文化产业科技主题的逆向响应机制揭示了媒介化治理中技术赋权与制度约束的博弈。中央政策强度从2018年的峰值断崖式下跌,体现政策焦点从技术驱动向民生服务的战略转移;而地方同期实现从零到逐步攀升的逆向增长,呼应2023年各省文化科技融合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这种地方自主性增强的注意力竞争,反映基层政府对技术应用的本土化坚守。当中央政策信号与地方现实需求错位时,基层通过政策解码重构治理优先级,因地制宜秉承在地化战略。

四类主题的响应差异共同揭示了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本质规律:政策效能不取决于中央文本的媒介化强度,而取决于地方解码过程中构建的“政策—实践”转化接口。中央通过价值型主题确立战略方向,地方依托操作型主题完成政策转译,最终形成治理工具从技术主导向需求导向转型、政策目标从文化保护向全域振兴升级的实施路径。这种动态适配过程,既强化了政策传导的顶层设计权威,又保留了基层执行的创新空间,构成中国之治在乡村文化领域的典型范式。

结语

通过对媒介化治理视角下乡村文化政策的主题演化与区域适配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政策主题呈现技术嵌入、主体激活、产业创新、制度协同四维耦合的演化谱系。数字文化服务、非遗工坊建设、文化产业科技、乡村全面振兴四大主题构成动态闭环,既体现媒介技术对文化治理形态的重构,也反映治理主体通过媒介平台实现的价值再生产。这一谱系印证了媒介化治理的双重逻辑,即中央通过政策文本构建制度框架,完成从技术工具到治理范式的战略升维;地方依托在地实践转译政策信号,实现从文化符号到实体载体。

第二,央地政策演化形成“创新驱动—选择适配”的传导机制。空间维度上,中央政策在数字文化服务与非遗工坊建设领域形成制度性势能,而地方通过“非遗+文旅”等模式突破“数字悬浮”困境,实现政策落地的实体化转译;时间维度上,中央完成从技术驱动(2018—2020)向全域振兴(2021—2025)的战略轮替(以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转折点),地方则通过资源整合与文化禀赋的差异化适配,形成东部技术驱动、中部协同创新、西部特色保护的在地化响应格局。这种分化既保障了国家治理目标的统一性,又为地方创新预留弹性空间。

第三,媒介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呈现“制度重构—实践转译”的动态平衡。中央通过文本媒介确立战略方向,地方通过实践媒介完成价值再生产。典型案例显示,云南非遗工坊建设依托乡土社会文化肌理,江苏则通过科技赋能强化地方优势。这种双向互动揭示了中国之治的独特性,媒介化治理并非单向传导,而是中央驱动与地方共创的有机统一。

为破解乡村文化政策执行中的区域适配难题,可分区域探索实施差异化对策与跨区域联动机制。

一是东部技术驱动区应深化数字基建与场景创新,聚焦数字文化服务的基层渗透,实施数字基建精准补缺工程,优先在浙江、江苏等数字基础较好的乡村地区部署5G基站与光纤网络,重点支持“文艺赋美”工程等沉浸式文化项目。二是中部协同创新区需破解资源整合制度壁垒,成立非遗资源协同创新中心,统筹跨省非遗线路开发,通过政策协同激励机制对文旅融合项目给予税收减免。推动“文化资源地图”建设,利用LDA模型动态追踪区域政策主题强度,为资源整合提供数据支撑。三是西部特色保

护区应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设立非遗保护专项基金,重点扶持云南、四川等非遗资源富集区的工坊建设,通过直播带货拓宽非遗产品销路,引入高校设计团队提升产品市场化能力。同时,联合高校开设“非遗电商”课程,破解人才断层困境,实现从保护到传承再到创新的良性循环。四是建立“乡村文化政策实验室”,试点央地主题强度匹配预警机制,推动区域政策创新经验的互鉴共融。通过东部输出数字文化服务标准、中部提供资源整合方案、西部输出文化活化样本,形成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产业发展的闭环传导,最终实现媒介化治理从中央单向传导向央地协同共创的范式转型。

媒介化治理为理解中国乡村文化政策提供了新视角,政策效能不取决于文本的媒介化强度,而取决于地方解码过程中构建的“政策—实践”转化接口。这种动态适配机制,既强化了顶层设计的权威性,又保留了基层创新的空间,为全球乡村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的典型范本。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数字人类学方法,深入田野捕捉媒介化治理的微观实践,推动理论深度延伸。

参考文献

- [1] 陈玲,段尧清.我国政府开放数据政策的实施现状和特点研究:基于政府公报文本的量化分析[J].情报学报,2020(7):698-709.
 [2] 郭强,刘冬梅.基于LDA模型的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政策扩散特征

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3(1):2-39.

- [3] 徐红,张斯婷,李凌方.基于LDA模型与共词分析法的农村阅读推广主题发现与热点分析[J].情报科学,2022(10):67-73.
 [4] 邓崧,龚伟.中国数字乡村政策LDA量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动力视角的二维分析框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5(3):49-58.
 [5] 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8-39.
 [6] 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君,等译.2021:23.
 [7] Andreas Hepp. Mediatisation and the “Molding Force” of the Media [J]. Communications, 2012(1):1-28.
 [8] 郭小安,赵海明.媒介化治理:概念辨析、价值重塑与前景展望[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59-67.
 [9] 李春雷,申占科.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J].新闻与写作,2023(6):5-12.
 [10] 丁和根,陈袁博.数字新媒介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传播渠道拓展与效能提升[J].中国编辑,2021(11):4-10.
 [7] 沙垚.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9(9):112-117.
 [8] 何志武,陈天明.因地制宜“仪”: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与乡村传播网络重构[J].编辑之友,2024(1):75-83.
 [9] 王鸣捷,白汶龙.乡村体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治理:基于“村超”的田野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1):161-168.
 [10] DAVID M B, ANDREW Y N, MICHAEL I J.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J].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03(3):993-1022.

Thematic Evolution and Regional Adaptation of Rural Cultural Policy under Mediatised Governance Perspective — An LDA-based Analysis of Central and Local Policy Texts

Liu Meiyi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rural cultural policy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unidirectional delivery to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53 rural cultural policy texts using the LDA Topic Model reveals that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workshop construction constitute the dual axes of policy transmission, while cultural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form the two pillars of practical translation. Both central and local policies present an evolutionary logic of “technology embedding — actor activation — industrial innovation — institutional synergy” and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novation-driven — adaptive selection,” while mediatised governance demonstrates a dynamic balance of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 practical translation.” Central policies build governance momentum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dia and form strategic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local practices realize policy translation based on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demonstrate localized strategie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n view of this, mediatised governance must balance the authority of top-level design with the flexibility of grassroots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 a mechanism for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nd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mediatised governance; LDA model; rural cultural policy; thematic evolution; regional adaptation

责任编辑:苇如